

丛书主编 王志明
副主编 徐一周 王卓华



桂东南学人文丛

桂村社会传播 网络研究

Guicun Shehui Chuanbo
Wangluo Yanjiu

冯广圣 / 著



桂村社会传播 网络研究

Guicun Shehui Chuanbo
Wangluo Yanjiu

冯广圣 / 著

丛书主编 王志明 王卓华

副主编 徐一周

成 员 黄健云 梁忠东 黄桂凤 余爱春
毛家武 肖霞 陈桂成 冯广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桂村社会传播网络研究 / 冯广圣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6

(桂东南学人文丛)

ISBN 978-7-5495-1540-0

I. ①桂… II. ①冯… III. ①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837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望州路 251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82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哲学·文学·文化

总主编 王志明

“哲学文学关系之密，古今中外皆同。西人多有哲学为文学之灵魂，文学以哲学为内涵之论。”这是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唐君毅先生之于哲学与文学关系的界说。哲学追求的是真理、抽象、理性、普遍与客观；文学本质是虚构、形象、情感与特殊。哲学作为一切学科的母学科，与所有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文学也不例外。文学可以更好地表达哲学，哲学可以更好地服务文学，文学形而上的思考就是指文学的哲学意蕴。

文学是“人学”，阅读文学作品是为了解决“人生”这样一个大问题，是为了追寻“诗意栖居”的人生境界，生命走向明晰、自由、敏感的境地是阅读中的期盼。然而，人生丰富复杂，很多时候并非逻辑论断可以概括。生命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的每一个细部的丰富而复杂，“人生”具有不可概括的无穷的可能性，此时就可以借助于哲学来进行阐释。

文学的阐释是多维度的。以“哲学”伦理来研究文学已然成为一



种趋势,在中外文学评论界里“常态”存在。对文学特别是小说而言,仅仅就艺术和文学作品本身的“就事论事”阐释解读往往是不够的,艺术作品必须去观念化,增加艺术的美感感悟性(即体悟文学的“哲学”意蕴研究),才能彰显文学的魅力。传统的艺术审美对文学文本进行解读往往致力于创作心理机制的追寻和阐释,以及理论接受者的主观因素,这往往就会缺少哲学思考。众所周知,作家在创作时是经由艺术的发现和艺术的追求来加工创作的,他们没有以既定的逻辑哲学来叙述故事(这也成为部分哲学文学无关论者的口实),但是故事本身就“潜隐”着哲理,哲理的存在是文学深层的内核。读者若能以“哲学的眼光”来解读文学文本,其深层的内核意蕴就得以呈现。从文学活动来说,哲学解读是一种再创造的文学创作方式,它参与了建设文学文本的内蕴生成性和建构性,也就是说文学的哲学意蕴是通过细读文本中哲学思考的探询和学理的分析,才能感悟出它的意识形态内蕴,才能追寻到终极的文学性。文学和哲学是不可分的。没有高度的哲学理性渗透其中的文学,将是凌乱的生活材料的组合和拼接,这种文学最多只能算是没有灵魂的故事;没有鲜活的生活体验为基础的逻辑推理的文学作品,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是难以想象的。

文学研究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从词源学考究,“文化”在拉丁文中为 *cultra*, 英语中是 *culture*, 原意为“耕种、栽培、居住”,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意义。经过对“人”的哲学阐释,文化于是就有了更深层次的现代意义,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这是多数人的共识。作为一种生活姿态,文化具象以模式化的形式存在于人们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我们常常会接触到“某某文化”,如“饮食文化”、“民俗文化”、“传媒文化”,等等。当我们探究追寻其意蕴的时候,文化成为一种视角、一种方法,也就成了一种学术姿态。追溯文化根源,认识文化本质,是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在这种认识中逐渐形成一种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融汇到社会意识的洪流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会起到助推作用。对于“文化”的讨论绵延不绝,试问“现在,还有什么不是文化?”

桂东南,从地域文化版图上审察,是一个远离文化中心之域。远古时代曾称为“南蛮之地”,很有边缘文化或亚文化的意味,历史上对桂东南社会文化的地位评价并不高,这与这片土地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历史积淀等诸多因素有关,与我们的信心不足也不无关系。其实,桂东南的文化并非人们“刻板印象”中那般不堪,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桂东南文化也有其独特的张力。桂东南毗邻广东和海南,受岭南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双重影响,坚忍不拔的“山岭精神”和勇于拼搏的“海洋精神”融合在“神鬼永不灭”的“鬼门关”和“巫文化”里,这铸就了我们更为坚韧、爱拼和广博的文化精神品格。追昔抚今,这里的人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涌现出一代代墨客文人、先贤才俊,为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现代的桂东南学人特别是以玉林师范学院诸多学者为代表的桂东南学人,在众声喧哗、浮躁难安的当下,利用桂东南唯一本科院校快速发展的机遇,承前启后,静坐南窗,进行着集体的学术思考和审察,续写着桂东南学人一如既往的辛勤探索历史,他们从桂东南基地出发,走向广西,延伸到全国,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从冯广圣的《桂村社会传播网络研究》、王易萍的《西部农村地区水利困境的文化人类学解读》、王卓华的《康熙博学鸿儒辑考》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研究轨迹。

桂东南的文学园地也同样五彩斑斓,同在桂东南文化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学人们借助哲学的阐释工具,从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从广西文学到中国文学,对文学进行了深入探究,王志明、郑立峰的《广西文学的哲学解读》就作了积极的努力。他们以哲学的元理论来观照广西文学,认为广西文学的创作主体在哲学理念上,自觉穿越边缘文化的局限,主动熟习中国中心与世界中心的先进的哲学文化意识和文学审美思想与叙事方式,培养自己在精神领域内跨越族裔或区域界限,作旅行式的思考与跨界思维。他们主张文学与文化要坚持“差异表述”的哲学内涵,坚持差异产生于边缘对中心的对话、挑战甚至对抗之中的理念。在文学创作上,坚守边缘人的自我的生命体验、审美情怀与文化哲学观念。这使他们克服了单一的边缘文化所



带来的局限,获得一种新的混合的文化立场,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哲学、审美情趣、艺术思维,乃至题材选择、叙事方式等,进而给广西文学带来全新的审美特质,提升了广西文学意蕴的深度。这种全新的审美特质既表现为对主流文学审美价值的抗诉和叛逆所带来的异质与异趣上,又表现为对主流文学审美价值的承接与沟通所带来的先锋性上。胡强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化阐释》把我们的视线延伸到古代,杨荣的《文学观念的裂变与重构——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转型研究》又将我们带回当下,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运用哲学的深层理论,对文学进行不同层面的探究,值得肯定!

《桂东南学人文丛》是继2010年出版的《桂东南社会文化研究成果丛书》之后的又一套展示桂东南学人成果的力作,前一套书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们有理由对本套丛书有更高的期待。我为桂东南学人取得的研究成果由衷地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期望未来更多的学人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将桂东南的文化精神发扬光大!

是为序。

目录

绪 论 >>>>1

- 一、研究缘起……………1
- 二、研究依据、现状和方法……………4

第一章 桂村概况 >>>>13

- 第一节 自然条件……………13
- 第二节 沿革……………15
- 第三节 社会变迁……………16
- 第四节 村民收入……………18

第二章 对桂村进行传播研究的两点说明 >>>>21

- 第一节 桂村传播研究若干基础概念的界定……………21
- 第二节 关于桂村社会传播网络研究范围的说明……………32

第三章 桂村人际传播网络 >>>>34

- 第一节 人际传播的传者与受传者……………37
- 第二节 村庄人际传播中的“三喻文化”现象……………41
- 第三节 一种特殊的人际传播：闲话传播……………46
- 第四节 人际传播与社会关系……………53



第四章 桂村组织传播网络 >>>>62

- 第一节 国家政权在村庄的组织传播.....63
- 第二节 村庄教育机构的组织传播.....67
- 第三节 一种特殊的村庄组织传播:民俗传播.....80
- 第四节 桂村村级经济的组织传播:旅游传播.....104
- 第五节 从桂村看村庄组织传播网络的功能.....126

第五章 桂村大众传播网络 >>>>132

- 第一节 报纸.....133
- 第二节 杂志.....135
- 第三节 书籍.....136
- 第四节 广播.....138
- 第五节 电影.....140
- 第六节 电视.....145
- 第七节 从桂村看大众传播网络的功能.....186

第六章 桂村新媒介传播网络 >>>>205

- 第一节 电脑网络.....206
- 第二节 移动通信网络.....226
- 第三节 新媒介传播进入村庄的社会影响与存在的问题.....238

第七章 从桂村传播研究看社会传播网络与村庄发展 >>>>243

- 第一节 从桂村看乡村传播网络的特征.....246
- 第二节 社会传播网络的基本功能.....251
- 第三节 社会传播网络“节点”与村庄能人.....260
- 第四节 社会传播网络与村庄变迁.....272

结束语: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网络的建构 >>>>279

主要参考文献 >>>>284

后 记 >>>>288

绪 论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年少时诵读的古诗，至今仍记忆犹新。农家子弟出身的我，对“三农”总有一种特别的情结，难以释怀。

——题记

一、研究缘起

乡村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承载形式，乡村社会的变迁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中国整个区位结构中乡村占据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变迁是社会各界有目共睹的现实。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问题。“十八大”提出我国正处于大力建设“新四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即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期。城乡二元结构带来发展不平衡，农村社会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导致影响农村稳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数量增多，引起党和政府

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决策。建设中的新农村是集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于一体的新农村。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没有新农民就没有新农村。罗吉斯曾说过：“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研究农民，对农民缺乏了解是造成很多发展规划失败的原因。”^①“三农”问题的提出，尤其是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农民生活变迁的重要时代背景和背后推手，地方政府的具体实施规划直接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新农村还为农民形成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产生重要影响。

农村、农业、农民的变迁，首先表现为村庄的变迁，村庄变迁的现状与前景不清楚等于对“三农”问题及其前景不清楚。农村转型首先是村庄转型。今后几十年内，仍然会有许多人口驻留农村，村庄转型仍将是农村中国农村转型的基本问题。中国目前有 60 多万个行政村，堪称“村庄大国”。关注、研究中国村庄的生存、转型和前景，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以村庄为研究单位，以村民传播生活为研究对象，以传播与村庄变迁的关系为研究目标是本书的旨归。

本书所说的“桂村”本名是罗政村，是广西北流市民乐镇属的一个行政村。遵从学术习惯，本书称其为“桂村”。“桂”为广西简称，“桂村”取名效法“江村”（《江村经济》中本名是开弦弓村）。本书通过对“桂村”个案的深入考察，讨论不同类型的乡村传播网络的功能，探究传播与村庄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一项传播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

村庄社区研究是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近年来逐渐扩大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新闻传播学对此领域的关注开始起步，但从民族志阐释视角的

^① [美]M.罗吉斯，J.伯格德：乡村社会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0页。

研究成果并不多见，郭建斌、吴飞、李春霞、卿志军、金玉萍的研究较有代表性。他们侧重典型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族、彝族、黎族、维吾尔族），考察电视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在社区发展的历程中，传播成为地区文化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传播已经从口语、文字传播与印刷传播时代进入电子传播时代，人们之间直接的互动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让位于间接的以大众传媒为主的传播网络。毗邻广东，地处桂东南的桂村是北流市乃至广西闻名的“明星村”，是个典型的“转型村庄”，是广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和样板村。新农村建设“一村一品”规划中，桂村选择了发展“生态旅游”为品牌。显然，现在的桂村再也不是施拉姆在《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开篇中所描绘的艾菲一家和巴尼一家那样处在封闭、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了；不是郭建斌、吴飞所描述的“独乡”；也不像李春霞所描写中国彝民村寨；不像卿志军笔下的海南黎族社区；不像柯克约翰逊笔下印度乡村……它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普通汉族社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各种传播形态交互影响，共同构成村庄的传播网络图景，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近 10 多年来，经济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媒体对村庄生活持续产生影响，新媒体的影响力度明显在加大。笔者以为，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观照普通的汉族农村社区，思考和研究传播与汉族农村社会转型的关系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传播是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更是人类社会得以构成、维持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本书“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以村庄为分析单位，以传播对村民的影响为切入点展开研究。以社会转型为背景，采用以传播民族志为主的多种方法，对当今中国的乡村社会的人际传播网络、组织传播网络、大众传播网络和新媒介传播网络予以“全景”展示，重点解读转型期中国村庄的社会传播现象，以获得对社会转型期的传播与村庄发展关系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的社会传播形成了城市传播与农村传播这两种不同格局的现实，这两种传播格局如今显然出现了某种失衡。城市化进程和城

市主流媒体发展的研究是传播学界始终关注的，乡村传播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乡村社会被看作一个被动的附属的存在。矫正这一视角需要有志于乡村传播研究者的努力。笔者的初衷是想研究“电视与农民日常生活的关系”。在实地调研中，笔者发现电视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固然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但其他传播媒介的影响依然不可忽略，若将电视从村庄传播图景中抽离出来考察，难以呈现村庄传播全景，只有和其他传播形式结合起来考察，从社会传播网络的综合视角，才可能整体把握传播对村庄社区社会变迁的作用。

为此，笔者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设，在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话语中，传媒可否发挥应有的链接作用？如何链接？以传媒为代表的文化因素能否作为影响和制约村庄发展众多因素的“催化剂”？等等。为此，笔者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一是桂村社区各种社会传播网络的信息是如何流动的？二是各种传播形态在村庄发展中起到怎样的作用？作用的机制如何？三是传播对于村庄发展的意义，等等。

二、研究依据、现状和方法

中国乡村研究 20 世纪初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并日益受到重视。他们使用民族志方法，以社区研究为主要范式，对中国乡村问题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研究。乡村研究在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成果颇丰。相比之下，传播学视野中的乡村社区研究园地还近乎荒芜，既有的研究也不够有力。

乡村传播研究属于发展传播学研究领域。中国学者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介绍发展传播学，主要是学习和借鉴国外发展传播学理论的研究进路，并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理论方法，代表性的成果学界多有介绍，兹不赘述。在介绍西方发展传播学理论的同时，中国发展传播学围绕“传播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以实证研究为重点，全面观察和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张国良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发展传播学”课题的完成，成功应用发展传播学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现

实。中国地域广，差异大。该课题研究9省份（上海、广东、云南、四川、江西、浙江、河南、甘肃、黑龙江）的发展传播个案，并不包括广西，这是本研究选择广西农村社区作为研究对象的缘由之一。国内学者努力探索发展传播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发展传播学的研究。总的来看，中国对国外理论的发展和研究还很不够，实证研究还处于数据整理和归类的水平上，对于基本规律的发现和掌握还需假以时日。

乡村传播学的民族志转向成为当前传播学本土化探索的新领域。作为传播学本土化的一种探索，乡村传播学在中国受到关注。谢咏才、李红艳为中国式乡村传播学学科的建构做了不少努力。在大众传媒与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变迁领域均有突破的学者有方晓红、益西拉姆、姚君喜等。方晓红教授指出，“农村在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却常被忽视的地域”，《大众传播与农村》的研究意义在于“不仅对江苏，而且对全国，都能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示范”^①。可惜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数量很少。已有的研究中把大众传播和农民意识变迁结合起来的并不多见。

民族志（ethnography）既可以理解为一种理论，但更多是把它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②民族志在某种程度上或明或暗是一项比较。面对未经调和的感觉之朴素的、实证主义的感悟，同样也不是独立的，恰恰相反，它成了一种普遍性的理解，直到它对任一社会的感知都强加了对所有其他社会的看法。^③集观察者、访谈者、记录者、分析者角色于一身的民族志研究是一项高度个人化的工作，个人是全部的研究工具，缺少团体的共同评价，研究结果多属地方化的个案研究，使用自己的参照架构，偶尔研究共同的研究主题，

① 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页。

② 吴飞，王学成：《传媒·文化·社会》，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5页。

③ [美] 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胡宗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05页。

也大部分是内省的，这些特质都阻碍了理论的建立。^① 民族志研究方法虽然受到广泛关注，但这一研究方法还无法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人类学者的问题：其一，研究者到底有没有办法全部真实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和真相？其二，反映了真实的现象以后又可以做什么？马凌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民族志模式移植到中国后，成为“微型社区研究法”。在民族志的时空架构上要努力尝试新的民族志模式；超越社区的空间视野和超越“现世”的历史视野，以充分的社区“深描”体现大社会的特征和动因。这种“深描”具有冻结历史的特点，只有将现时期“冻结”，我们才能对当下的社区传播形态进行全景式的描摹，这是民族志的优势所在。

国内传播学者对于民族志关注的并不多，蔡琪、常燕荣对传播民族志做过介绍。郭建斌教授对独龙江做过半年的民族志田野调查，系统考察和探讨了电视与独龙族村民的日常生活情况，其研究成果《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开新闻传播学民族志研究的先河。童兵教授在复旦博士文丛的序言中给此方法以“志在新奇无定则”的评价。稍后，四川大学李春霞的博士论文《电视与中国彝民生活——对一个彝族社区的电视与生活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也是民族志研究的成功典范。复旦大学金玉萍的博士论文《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电视使用——托台村维吾尔族受众研究》，是对维吾尔族电视受众的民族志研究。中南民族大学龙运荣的博士论文《大众传媒与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则主要采用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考察了大众传媒对村落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消解，引发村民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的变迁，加速了村落传统习俗的转型，引起了民族社会文化的急剧变迁，这是对大众传媒作为现代化“推进器”功能的检视。华中科技大学张斌的博士论文《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从乡村政治传播的视角，考察了大众传媒对三个少数民族村寨（多点民族志）政治生

^① 吴飞，王学成：《传媒·文化·社会》，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9页。



活的影响,尤其关注了“节庆传播”中的政治元素,拓展了单点民族志的研究视野。浙江大学吴飞教授的《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也主要是民族志方法取得的成果,本研究期望能在此基础上将社会传播网络的研究更推进一步。^① 这些是目前见到的从新闻传播视角进行的较好的民族志研究。他们以少数民族地区农民为研究对象,以电视传媒与社区的发展变迁为考察目标,有一定的价值。近年来也有一些硕士学位论文尝试采用民族志方法对电视与村民日常生活等进行考察,但视角仍显单一,多数也侧重少数民族地区,大都停留在简单的参与观察的表层,少有深度分析,没有多少突破,研究成果不再列出。本研究选取为人们“习焉不察”或“习以为常”的一个普通汉族社区——桂村来进行研究,也是运用民族志为主要方法的一个尝试。

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是普适万能的,本书结合运用多种方法,力求得到较好的研究效果。下面就本书所采用的几种方法作简要交代。

(一) 民族志法

民族志法可能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又称田野调查法,研究者主要通过田野调查,深入某些特殊群体的文化中去,从其内部着手,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整体描述与分析。此方法强调研究者必须“长时间参与”或以“一对一的访谈”方式搜集数据,而且要重视他们的真面目,叙述他们如何行动、如何交互作用、如何建构意义、如何加以诠释等问题。其目的在于发现他们的信念、价

^① 本研究参考并借鉴了吴飞教授对独龙江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的研究框架,表面看是用一个汉族农村社区“置换”了独龙江社区,因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不平衡性及层级性,本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比研究而非重复研究,笔者利用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努力探究中国农村社区社会传播网络的异同,试图将中国乡村传播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



值、观点和动机等。^①同时还强调,要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分析与解释。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长期融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并直接观察研究对象的行为,同时做出理性的判断、分析与研究。^②民族志总体而言是一种质化研究方法,它在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并取得丰富成果,它应用于传播研究,虽然时日不多,却已显示出巨大的活力。民族志研究方法未来有何转变,目前还没有定论。

传播民族志是传播学者研究传播现象和规律的工具。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总要选择一个地点来施展个案研究。个案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要考虑个案的意义和代表性,又要照顾调查的方便可行。有些个案可能非常具有代表性,但却很难进入现场,很难了解到真实的内幕。在进行调查的时候,人们往往非常重视关键人物的信任,从而获得进入现场的机会,这个关键的人物被称为“看门人”。笔者幸运地获得了这个“看门人”的信任,得以顺利进入田野。本研究主要采用民族志方法,对位于中国广西东南部一个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展开田野调查,努力呈现这个村庄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全景,力图描绘村庄的“传播地图”。笔者努力按照民族志的规范和要求进行了田野调查。笔者以“他者”身份,与一个家在当地的同事和熟悉本土方言的两个学生一起,于2009年10月13日首次进入桂村调研,就村民的媒介接触、媒介选择及媒介内容偏好等进行问卷调查,这是笔者当时承接的广西教育厅课题的内容。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大众传媒在农村的分布概况,检验了研究假设。2010年5月10日,笔者与当地村干部取得联系,表达了研究意向,获得了他们的大力支持。这为2010年7月12日,正式驻村

① 吴飞,王学成:《传媒·文化·社会》,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5页。

② 燕荣,蔡琪:《民族志方法与传播研究》,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2)。